



大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Distr.: General
22 March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正式记录

大会
第二委员会
第 19 次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1 年实质性会议续会
第 52 次会议

第二委员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全球经济形势和主权债务危机”的联席会议简要记录
2011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9 时 30 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联合主席： 穆明先生（第二委员会主席）（孟加拉国）

联合主席： 卡潘布韦先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赞比亚）

主持人： 沃斯先生（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特邀发言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教授）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有关记录的印本上做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之日后一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DC2-750, 2 United Nations Plaza）。

更正将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在届会结束后印发。



上午 9 时 50 分宣布开会。

第二委员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全球经济形势和主权债务危机”的联席会议

1. **Momen 先生**（联合主席）说，本次会议是第二委员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全球正在经历经济和金融危机，传统经济模式此时无力应对失业率高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乏力且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等种种挑战。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繁荣机会，但也削弱了国家对于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在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世界中，最脆弱的国家很有可能依然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除非发展伙伴做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同时辅之创新的筹资机制。

2. 近一年来，危机已经出现了新变化，多个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主权债务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相互关联，这场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会使这些发达国家自身面临金融和经济困境，而且可能拖累世界其他国家。本次会议的目的是让所有与会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相互关联的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并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指导下，思索适当的对策。斯蒂格利茨教授将在本次会议上同与会者交流见解和观点。

3. **Vos 先生**（经济及社会事务部）担任会议主持人。他说，全球金融形势在年初显露出复苏迹象，但随着私营部门的问题开始蔓延到公共部门，国际金融界目前似乎即将面临一场更加严重的灾难。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纠缠一起，并且与引发关切的其他诸多因素密不可分，这其中包括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剧烈波动以及各国政府明显无力拿出全面解决危机的政策。同二十国集团（G-20）一样，欧洲联盟正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同时努力应对连续两次经济衰退的风险。

4. 要说当今世界是否正在新危机的边缘摇摇欲坠，没有比斯蒂格利茨教授更适合的人选了。作为衡量经济业绩与社会进步委员会的主席，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当前的挑战。这个委员会在 2009 年向大会提出了或许能够解决 2008 年和 2009 年危机背后隐藏更多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解决方案。

5. **Stiglitz 教授**（哥伦比亚大学）说，当前的全球灾难是从美利坚合众国的次贷危机开始的，随后扩大到世界其他地方。欧洲目前正在将这场危机重新推回美国。经济挑战十分严峻，但应对这些经济挑战的政策框架却显不足：事实上，很多国家正走向错误的方向。

6. 在危机爆发之前，主流观念始终认为，经济一体化和多样化能够降低风险；证券化和金融产品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美国向欧洲输出了大约 40% 的不良抵押贷款；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美国的衰退会严重得多。但总体效果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原因涉及基础经济学和经济学当中的基础数学。可以借助比喻来解释这一点。为更有效地利用发电能力，建立了一体化程度更高的电力系统，但这个电网的一部分出现故障，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瘫痪。当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小镇出现的一个问题导致整个东海岸断电，就是这种情况。负责人员当时认识到，过度一体化系统可能极不稳定，因而在系统中加入了各种断路开关。在金融系统中，通过资本管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危机过后出现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资本管制在某些情况下是件好事。联合国所持的立场，以及他十年前在世界银行所持的立场，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一部分。管理资本账户的必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

7. 当前的危机与大萧条一样，实际上是多种不同危机的混合体。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使得问题更加复

杂，但当时与现在一样，经济问题、金融问题和货币制度问题同时存在。在关于大萧条的辩论中，人们往往指责美国货币管理部门，即联邦储备委员会，没能尽快增加货币供应，致使情况变得更糟。这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得出的教训。但目前的危机表明，这种分析多半是错的。在增加货币供应量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伯南克主席。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资产负债表在极短时间内从 8 000 亿美元增加到超过 20 000 亿美元。然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虽然史无前例，但经济并没有恢复。在拥有全球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经济体中，有 2 500 万美国人找不到全职工作。灵活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当数百万美国人被赶出家门的时候，肯定是出了问题。供求关系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挥作用。

8. 对于 2008 至 2009 年的危机，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使金融部门恢复正常，经济就会回归正常。因此，向各家银行注入了数千亿美元资金；与提供给最贫困者的福利相比，这简直是无条件地给予。但银行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将这笔钱用于放贷，而是用来支付奖金和红利。人们虽非完美、但合理的方式修复了银行系统，但经济仍然存在问题。银行一如既往地发放天文数字的奖金，但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9. 既然从金融和货币两方面都解释不通，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早在危机爆发之前的 2007 年，经济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在危机之前的 2006、2007 和 2008 年，经济依靠人为泡沫在维持，这种泡沫导致消费水平达到前所未有、且难以为继的水平。美国的储蓄率降到零；处于社会下层的 80% 的美国人花掉了自己收入的 110%。正如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所言，这种不可持续的做法是不会持续下去的。

10. 那么下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在 2006 和 2007 年，为什么需要人为泡沫来支撑经济正常运行？原

因之一是世界经济当时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大萧条时期是另一个结构性转型期。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农业生产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与大多数人靠生产粮食为生的 19 世纪相比，生产粮食所需的人口越来越少。例如，目前只有 2% 的美国人从事粮食生产，他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即便是这个肥胖症盛行的国家都吃不完，美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现在，制造业取代了农业，制造业生产力的增长超过需求的增长，由此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其他部门，特别是服务部门。

11. 在大萧条期间，人们从制造业转向农业，但那时的收入降幅很大，致使人们无法脱离农业。在 1920 年代的美国，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在短短 10 年内从 30% 降至 25%，但在 1930 年代，随着收入的减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外流的现象彻底停止了。从 1929 到 1933 年，美国农业收入下降了 50%，由此造成四分之一的人口不需要工业制成品，从而导致制造业减少工作岗位。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致更多人失业，也降低了全球总需求。政府不仅可以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在推动新旧部门转换的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以后者为甚）协助人们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具体途径不仅包括政府的巨额支出，还包括对《退伍军人权利法》和教育的投入，对美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现在，人们需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部门，但高失业率使他们裹足不前。

12. 此外还有其他问题。在 1990 年代，约有 80% 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完全是由于生产力提高所致。此外，全球化导致制造业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具备相对优势的其他国家。另一个问题是不平等，富人比穷人消费得少。收入得到重新分配。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西班牙和世界各地的“愤怒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现在，美国 1% 最富有的人

口攫取了 20% 以上的收入，同时拥有 40% 以上的财富。如此多的收入进入社会上层，而这些人对于商品的需求却比较少，这就与大萧条之前的情形一模一样。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这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其中某些问题涉及到前面提及的结构性转型。

13.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总需求是很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其他机构没能控制住最近一次全球危机，即 1997 至 1998 年东亚危机，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各国决定必须增加储备金，防止再次丧失经济主权。因此，各国设立了数万亿美元的储备金。这种做法可以增强国家自主权，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但这样做意味着减少支出。从全球来看，人们为增加储备而不再花钱，导致全球总需求每年减少数千亿美元。危机发生后，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情况最好的国家是那些储备金最多的国家；因此，各国继续增加储备资金。另一方面，由于更多的失业致使工资水平降低，不平等现象加剧。衣食无忧的人是华尔街上的那些精英。

14. 从全球来讲，问题是由于油价高涨导致从石油消费国向石油生产国转移的收入再分配同时也影响到全球总需求，特别是鉴于石油生产国出于对石油价格波动过大的审慎考虑，储蓄率比较高。因此，即使是全面修复金融系统，也无法让经济恢复正常。即使是在减债之后，依旧放任社会下层的 80% 的美国人花掉自己 110% 的收入，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减债势在必行，但如同抵押贷款问题一样，在泡沫破裂四年之后，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但即便解决了减债问题，全球经济问题仍然存在。

15. 现在又出现了欧元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欧洲的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之比低于美国。希腊债务只占欧洲国内总产值的一小部分，在欧洲财富中所占比

重更小。真正的问题出在欧元货币制度本身。曾经起到调节机制作用的汇率机制和利率机制被取消，并且没有设立任何替代机制。需要建立一个财政框架，这不仅仅是财政紧缩框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和增长公约》可能更适合名为《不稳定和不增长公约》：危机发生之前，西班牙和爱尔兰一直有财政盈余，债务与国内总产值之比也不高。这两国遵从了当时的要求，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提出的要求——放开市场和放开管制。这些国家让泡沫继续增长。西班牙等国遵守了这种中规中矩的观念，目前不得不面对 40% 以上的青年人长期失业的困境。假如欧洲国家能够表现出某种团结，利用共同资源来解决各国的具体问题，欧洲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假如欧洲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甚至极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全球问题。

16. 欧洲已经建立了新型金本位制，从而削弱了应对危机的能力。金本位制不是引发危机的原因：原因是一种调节机制，更准确地讲，是缺乏一种调节机制，欧元就是这种情况。有人建议欧洲实行财政紧缩，以摆脱危机。但是，假如希腊等国家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国内经济将会遭殃，因为收入降低意味着税收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西班牙采取财政紧缩措施之后，该国的信用等级立即被下调——因为市场认为西班牙会信守其承诺，而不是因为市场认为西班牙会违约。由于财政紧缩导致国内总产值和收入减少，市场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维持财政状况既不会好转，也不致恶化。在市场看来，一个国家采取财政紧缩措施，不会产生全球性影响。但是，假如多个欧洲国家同时采取财政紧缩措施，整个欧洲将变得软弱无力；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假如欧洲软弱，那么人人都将无力。

17. 在美国，也有人谈到财政紧缩和减少赤字问题。假如这就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那么谈论这些并不困难。十年前，美国的盈余规模之巨，曾促使时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表示，如

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美国的所有国债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全部偿还完毕，这会让他难以执行货币政策。因此，他敦促政府为美国的富人减税。问题是从巨额盈余被视为有问题，到当今放眼尽是无法控制的赤字，这个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18. 仅仅四样东西就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了美国的财政状况。第一，实施了超出国家承受能力的减税政策，特别是针对富有的美国人。第二，进行了两场非常昂贵的战争，这些战争不仅没有增强美国的安全，而且为加强国防花费了数万亿美元，美国目前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军费总和。但是，这数千亿美元购置的武器对于根本不存在的敌人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些钱被白白浪费掉了，对于拱卫国家安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第三，制药公司享受特殊待遇。美国是最大的药品买家，在10年中为药品支出数千亿美元，却没有讨价还价。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家正处于衰退之中。

19. 消除美国财政赤字的最佳办法不是采取财政紧缩措施，而是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很多国家。那些在财政上有能力花钱的国家就应该花钱。美国还有另一个显著优势。过去20年，美国在基础设施、技术以及教育领域的投资不足，对这些领域的投入将产生高额回报，远远高于为借款支付的利息。但在美国，有人在谈论削减开支和减少投资，这将损害美国的未来。步调整齐的财政紧缩措施是全球经济自杀的毒药。

20. 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倒闭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应该花钱，应该采取刺激措施。刺激措施确实起到了作用，但与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相比，这些作用太小了。如果没有刺激措施，美国的失业率会飚升到12%以上，而不是10%。世界各国如果不采取协调一致的刺激措施，出现全球大萧条的风险就会非常高。问题是，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正在利用这次危机来实现其他目标，特别是缩减政府规模这一

隐密的目标。投资必然产生赤字，但由于税收的增加，日后便可降低赤字与国内总产值之比。目光短浅的金融部门认为，必须维持预算平衡，无视“平衡预算乘数”的基本经济学原则。根据这项原则，同时增加政府税收和政府开支，可以提高国内总产值，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如果目标是创造就业机会，即使是在降低赤字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扩大政府规模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选择进行投资和向富人征税，以乘数较高的开支领域和乘数较低的税收领域为重点，平衡预算乘数实际上可能会很大，而税收每增加一美元将转化为国内总产值增长两到三美元。

21. 美国全国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鲍尔斯·辛普森报告》）明确提出的议程是降低税务系统的累进性。这项以加剧社会不平等为目的的议程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因为日趋严重的不平等正是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

22. 他重申，即使全面修复金融系统，经济也不会回归正常，因为危机前的经济就处于由泡沫支撑的人工呼吸状态；那种泡沫再也不可能重现了。在美国，投资基本上回归正常，银行又在发资金了，但金融系统尚未修复。某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实际上更加严重了，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银行太大不能倒闭的问题、坏账问题以及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不透明问题。例如，缺乏透明度，难以确定银行是否运转良好，这些问题甚至影响到监管者的判断，例如，监管部门不久前曾认为欧洲银行状态良好，但这家银行随即破产。如果连管理者都无法判断一家银行是否有实力，市场上的普通投资者又何以得知呢？只要是明显缺乏信任的基础，自称已然恢复信心的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一些人曾经预言经济即将复苏，他们的公信力实际上已经受损。为应对危机，银行合并，集中化程度增加，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银行太大不能倒闭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过度冒险的情况仍在继续。

23. 遗憾的是，由于关注短期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些长期问题进一步恶化。为推动经济回归理性的正常状态，有能力获取资金的国家必须扩大投资，加快当前及今后的经济增长；必须制订政策，用以促进平等，推动全球结构性转型，减少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但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日本式的长期低靡，他在危机初期就预测到了这种结果。

24. 最后，他重申了联合国委员会（他在两年前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报告提出的观点：这次危机是一次全球危机；所有国家相互依存；某一地区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新兴市场的确成绩斐然，虽然欧洲和美国陷入混乱，但新兴市场可能会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显而易见的是，假如欧洲和美国能够做得更好，全球所有国家都将受益。全球经济合作是绝对必要的；目前的框架不够。鉴于显然需要比以往进行更多的协调工作，该委员会建议设立全球经济协调理事会。他希望当前的混乱局面能够让世界警醒，认识到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并进一步加深全球经济合作。

25. **Vos 先生**（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作为会议主持人，感谢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发言，特别是感谢他用一种略显乐观的口吻结束发言，尽管他表现出深切的悲观情绪。他请与会者提问。

26. **Das 女士**（联接模型）说，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很低，但现在却高了，而且支出不足。要恢复消费水平，同时又不会引发另一场危机，应该采取哪种适当的方式？

27. **Rahman 先生**（孟加拉国）询问，斯蒂格利茨教授会为最不发达国家提出哪些建议，其中一些国家面临严峻的结构性制约，并且已然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对于到 2020 年逐步成为发展中国家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

28. **Mahmood 先生**（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说，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认为生产力的增长超过了总需求的增长。这补充了劳工组织的如下论断——假如将增长过程分解为生产力和就业，平衡处于这一过程的核心位置。各国对于经济增长的渴望基于不断提高生产力，而这会导致就业问题。他请斯蒂格利茨教授就此发表意见。

29. **Ovalles-Santos 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说，77 国集团国家对全球经济前景暗淡深表关切。目前最需要的是全面改革金融系统。为此，他请斯蒂格利茨教授阐述关于设立全球经济协调理事会的建议。这个理事会是财政部长级别的，还是成员国级别，抑或是某个专家委员会的必然成果？

30. **Acharya 先生**（尼泊尔）说，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20 国集团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不具有代表性。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尼泊尔等国面临的挑战能够在全球层面得到适当考虑？

31. **Stiglitz 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在回答有关美国储蓄率的问题时指出，美国的储蓄率先是降至接近零点，目前在 5% 或 6% 上下波动。有专家称美国消费正在逐步恢复元气，但这个百分比反映出的是美国国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可以这样认为，最富有的 20% 人口的储蓄率约为 15%，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其余 80% 人口的储蓄率为零。在危机发生之前，社会下层 80% 人口的储蓄率为负 10%。鉴于美国无法恢复以前的消费水平，问题是：拿什么来填补这一差距？他不同意某些所谓经济专家的看法，其中一人大谈全球过度储蓄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存在储蓄过量的问题。到处都有巨大需求，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改进世界经济来适应全球变暖，需要投资来提高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问题其实在于，全球金融市场没有适当利用储蓄来满足世界经济的真正投资需求。从全球来看，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修复全球金融市场。对此，20 国集团的对策是鼓励某些地区增加消费，但是，假如人人都采用大手大脚的美国消费方式，世界将走向毁灭。从环境角度讲，哪怕仅仅是从物理角度来讲，如果人人都采用物质至上的方式消费，地球将无法幸免。必须做出改变，而改变是需要投资的，这些投资将改变经济结构。

32. 近几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了一些值得赞赏的变革，并且变得更加开放。基金组织正在认识到不平等与波动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平等是它的一项任务，因为维护稳定也是它的一项任务。由于有大量证据表明，不平等与稳定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基金组织开始适当关注不平等问题。同基金组织在资本账户管理问题上采取新举措一样，这也是一项重大变革。

33. 劳工组织代表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结构，生产力的增长可能会造成失业，这一点非常切题。假如生产力的增长超出了对于工业制成品需求的增长，实际上将引发就业问题，这就如同假如没有引导人们走出农业生产，那么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将造成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人首先转向了制造部门，而现在，制造部门也出现了类似的生产力问题。当经济运行良好时，人们在各个部门之间流动，流动性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国内总产值净额就会增加。他指出，即使生产力的提高拉动国内总产值增加，事事进展顺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既有赢家，也有输家，人们寄希望于赢家可能会补偿输家，但他们极少这样做。但在通常情况下，当市场运行不力时，人们无法实现部门之间的流动，困在一个错误的部门动弹不得，收入也随之下降。因此，当前的挑战是要找到调整国家经济结构的办法，设法让人们从不需要他们的部门转移到需要他们的部门。这项挑战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格外艰巨。

34. 储蓄过剩概念特别令人讨厌的原因之一是，有些国家需要大量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和技术开发，发达国家应尽力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多援助。近年来，多个非洲国家实施善治，具备良好的宏观经济框架，实现了资本流通，但即便是在这些国家，金融市场仍然无法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本。因此，确实需要官方援助。实际上，当今世界提出的要求之一是深化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本构成：近 20 年来，全球经济不断扩大，但世界金融机构却没有跟上前进的脚步。

35. 自从布雷顿森林机构在 60 年前成立以来，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市场现在的收入远远高于 1945 年的欧洲和美国；这些国家拥有资源来设立自己的机构、协助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互相帮助。事实证明，安第斯开发公司等合作机构在筹资方面卓有成效，而且利率远远低于任何个别成员能够获得的利率。因此，现在是时候应该反思全球经济体系了。

36. 之所以提议设立全球经济协调理事会，原因之一是 20 国集团缺乏包容性、代表性和政治合法性，将所有国家团结起来的国际机构是联合国。尼泊尔代表也认同这一观点。基本设想是建立一个小组，负责解决这些复杂问题，但这个小组必须具有代表性，拥有合法性，并且能够反映出各国的不同观点和国情。在 2009 年举行了 20 国集团会议，发生全球灾难的征兆在当时已经清晰可见，世界走到了一起。但现在，世界不同地区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势。新兴市场正在迅速增长，欧洲和美国则处境艰难。他重申，对于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等可以扩大财政空间的国家来说，财政紧缩措施是错误的道路。

37. 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他说，各国能够借以自救的重要机制之一是贸易。2001 年，各国共同参与了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但事实已经证明这项谈

判徒有其名，在随后的几年里，欧洲和美国基本上没有履行其发展承诺。通过“除武器外的所有产品”倡议，欧洲采取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以极小的代价向最不发达国家开放欧洲市场，这种做法事实上可以让欧洲获得某些裨益，同时为最不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遗憾的是，美国没有效仿欧洲的做法。美国已经同意向 97% 的最不发达国家产品开放市场；例如，美国同意进口来自孟加拉国的所有商品，但孟加拉国实际产出者除外。因此，孟加拉国可以向美国出口喷气式飞机，但不能出口服装和纺织品。然而，重要的是美国加入了在欧洲和美国国内开放市场和扫清非关税壁垒的努力；在当前背景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38. **Vos 先生**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作为会议主持人，请与与会者继续提问。

39. **Gangnes 先生** (联接模型) 询问斯蒂格利茨教授，他认为美国和欧洲是否有可以避免财政紧缩陷阱的政治出路？是否还有余地达成某种重要的妥协？他尤其想知道的是，作为决策者的伯南克是否应该追随作为学者的伯南克，并尝试提出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

40. **Busuttil 先生** (欧洲联盟) 说，就在前一天，欧洲理事会在布鲁塞尔重申，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欧元区的稳定。一揽子计划包括在技术上和政治上相互关联的五项要素，即：各国政府采取有力行动，确保可持续的公共财政和推动增长；为希腊问题提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建立强大的防火墙，防止危机蔓延；通过统筹协调方案调整银行的资本构成，改善银行资金状况，从而恢复人们对于欧洲银行部门的信心；最后，改善欧元区的治理，深化欧元区一体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的指导方针有误，并呼吁采取积极的刺激措施。欧洲联盟的危机管理工作可能看上去既迟缓又零散，但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考虑到欧洲联盟内部包含

多个成员国的复杂结构。实际上，在解决公债不断增加的问题上，欧洲联盟是一个先驱者；在调整银行系统的资本构成方面，欧洲联盟做出了重要努力，由此取得的突出成果是事先大幅增加银行资本，同时让各国政府明确承诺提供财政支持。在全球层面和在欧洲内部，欧洲联盟都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欧洲联盟认识到，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是这个时代的挑战，欧洲联盟将继续拿出政治决心、勇气和政治才干来迎接这一挑战。

41. **Dennis 先生** (利比里亚) 说，利比里亚等冲突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全球经济复苏，以便作为相互关联的世界的一部分做出自己的贡献。美国经济一直是其他国家用来衡量本国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标杆，但美国没有能力从必要的全球层面着手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他想知道，美国怎样才能推卸对于这场危机承担的全球责任。

42. **Al Dardari 先生** (联接模型) 说，阿拉伯世界的各国政府面临转型或蒙受巨大压力，而青年此时此刻对于创造就业机会抱以厚望，他问斯蒂格利茨教授，对于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决策者可以提出哪些建议。

43. **Pauly 先生** (联接模型) 说，斯蒂格利茨教授青睐的那种国际政策协调在以往的历次尝试均令人沮丧。现在有何不同？阻碍是什么？有没有乐观的理由？

44. **Stiglitz 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 说，仅凭货币政策无法解决这场危机；况且，货币政策使得危机加剧，特别是由于货币政策在放松管制以及确定利率和杠杆比率等方面的作用。联邦储备委员会限定美国最高利率的做法并没有增加贷款。大银行得救了，但负责向中小型企业发放贷款的小银行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美国各地有 300 家小银行破产，另有 800 家小银行岌岌可危。此外，由于发放给小型企业的贷款大多是不动产抵押贷款，货币管理当局未能稳

定房地产市场，房产价格持续下降，严重妨碍了贷款。有学术观点认为，降低利率可以促使人们增加投资，这是导致危机的愚蠢模型做出的典型愚蠢推理。事实上，人们对于利率变化的反应往往相对很小。

45. 危机发生之前，美国房地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40%，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建成房屋的数量超出了今后5年、甚至10年的需求。制造业的问题因房地产问题而更加复杂，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货币政策的成效持悲观态度。第一轮量化宽松（QE1）政策没有成功，第二轮（QE2）也没有起作用。全球化要求人们具备全局视角。在全球化世界里，银行借钱给迅速增长的经济体，而不会把钱借给病弱的国家；换句话说，银行把钱借给了新兴市场。由此可见，全球开放经济体中的货币扩张与封闭经济体中的货币扩张有着很大区别。在开放经济体中，资金大多被投入不需要资金的领域，而不是流向需要资金支持的领域。巴西和其他多个国家都曾经抱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货币扩张正在伤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因此，这些国家加强了资本管制，试图推动资金回流，而资金流动正是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能赖以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结果是货币政策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而重点应该放在财政政策上。并非每个国家都有余力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等盈余国家）的确可能会从事更多扩张性活动。

46. 关于可能达成重大妥协的问题，他对此持悲观态度。当今美国政界没有考虑采纳他前面概述的框架，其中涉及增加税收，特别是针对乘数较低的社会上层，以及增加用于失业福利和投资方面的支出，这方面的乘数较高，能够推动长期高增长。

47. 多名欧洲领导人全力致力于解决各种问题。他们确定的问题值得关注，制订的计划安排也基本合理。7月21日，欧洲联盟就希腊债务危机达成协议，

各国领导人认识到财政紧缩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通过一家欧洲投资银行或团结基金提供援助，以便刺激面临此种危机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缺乏资金，像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希腊持续衰退。

48. 主要问题是政治和经济的推进速度不同步。7月21日协议是一份不错的协议，但至今没有见到成效。这并不是由于执行工作进展得特别缓慢，而是由于执行速度赶不上飞速变化的金融市场。另一个问题是欧洲过度注重财政紧缩。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情况表明，《稳定和增长公约》不起作用，但并没有找到替代框架。替代办法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财政联盟，各国共享财政实力，这有点像是欧洲契约，为每一个国家提供支持。但是，能否尽快做到这一点，则是一个大问题。麻烦在于，如果不能团结一致，欧洲联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货币联盟的作用。一种货币的存在不仅仅需要自由贸易和人口的自由流动。

49. 欧洲中央银行在购买各国公债方面做得很好，但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属于1970年代，而不是21世纪；而且，欧洲中央银行不愿进一步调整由希腊或其他问题缠身的国家所发行债券的结构，这是妨碍解决欧洲危机的一项障碍。他赞赏某些领导人做出的承诺，但同时指出，要让这个制度发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团结。

50. 针对关于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他说，出现“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之一是青年严重缺乏就业机会，此外还有一种不平等感：那些获得就业机会的人，往往是有社会关系的。实际上，当前世界各地的抗议运动都在指责公平的缺失。在中东，人们感到幻灭和沮丧。人们曾经尝试过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市场模式，但没有起作用，反而加剧了不平等。人们曾经尝试过社会主义，但也没有成功：没有增长，只有腐败。但确实存在替代办法。遗憾地受困于欧元危机的欧洲社会模式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很好的经济

模式。存在多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形式；我们只需要找到正确的那一种。华盛顿共识模式甚至在华盛顿都不起作用；这种模式引发了全球危机。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试验，现在需要进行第三次尝试，成功的前景比以往要大得多。

51. 最后，关于政策协调问题，他说，要做到这一点极为困难，但假如做不到，则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困境。在当今世界，一国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在大萧条期间，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各国都力图自救，也使得全球经济走向衰退。竞争性货币贬值起到同样的作用，一国试图维持汇率，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因此，他认为全球经济政策必须首先确定外在因素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认识到对于一个国家的援助行为对其他国家可能有利有弊。最后，他再次建议设立全球监管机构，例如全球经济协调理事会，作为考虑上述外在因素所需的机制。

52. **Vos 先生**（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作为会议主持人，感谢斯蒂格利茨教授，并表示不日即将召开的联接模型会议将为深入探讨全球关联的复杂问题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斯蒂格利茨教授着重强调了如下问

题的重要性：分析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以及，了解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和商品价格波动。他还强调需要进行长期投资，以便解决结构性问题。加强政府干预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同时，人们需要对政府的能力有信心。这是在联合国范围内就本次联席会议的思路进行深入互动对话的良好起点，他希望此次联席会议能够成为一项经常性活动。

53. **Kapambwe 先生**（联合主席）感谢斯蒂格利茨教授发表的真知灼见。他强调，经济和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再加之正在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并威胁到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取得的多项进展。在这方面，联合国在协调国际政策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必须坚定地维护其全球领导作用，在与 20 国集团、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全球和区域行为者的进一步密切合作中也必须做到这一点。他希望第二委员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合作举措（例如本次会议）能够有效地推动关于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和发展等复杂问题的政策讨论。

上午 11 时 45 分散会。